

甘肃通史

刘光华 主编

当代卷

王 劲 吴晓军
李春芳 卢毅彬 著
GANSUTONGSHI



读者出版集团
DUZHE CHUBAN JITUAN
甘肃人民出版社



甘肃通史 当代卷

GANSUTONGSHI



甘肃通史

当代卷

责任编辑／赵金祥 装帧设计／徐晋林

甘肃通史
当代卷



写在《甘肃通史》出版之际

知史明志，鉴往开来。一部浸润、凝结着甘肃人文精神与民族之魂的《甘肃通史》付梓刊行，这是甘肃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一件盛事与喜事。

一

甘肃历史上曾多次编修通志，仅现存的明清到民国的刊印本和稿本就有四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非常重视史志编纂工作，各个省区市也都纷纷投入财力、组织专家编写地方史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二十余年间，总计80卷、4000万字的甘肃省志编撰工作已基本完成。然而，方志的编纂并不能代替通史的撰写。志书重在客观记述，保存资料，通史则重在勾勒历史演进的过程，总结发展的规律和得失，各有侧重、互为补充。因此，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有识之士就提议编写《甘肃通史》；80年代中期，先后出版了《甘肃古代史》和《甘肃近现代史》，此为甘肃通史类著述的发轫之作，功不可没。此后近二十年来，甘肃地方史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收获了很多成果，积累了丰富资料。推动甘肃经济繁荣、文化丰富、政治文明、社会和谐、生态优美，编写一部客观地、历史地、辩证地反映甘肃悠久历史的《甘肃通史》的条件已完全成熟。

2003年，甘肃历史学界、新闻出版界在省委省政府领导的支持、关怀下，甘肃省新闻出版局与读者出版集团共同策划的《甘肃通史》正式立项，着手组织省内外专家编纂《甘肃通史》，并成立编纂委员会，指导协调《甘肃通史》的编纂。

为保证《甘肃通史》的质量，编纂期间，编委会多次召开座谈

会，广泛邀请社会专家参与论证、研讨，拟定了翔实可行的编写计划，并形成四点共识，作为撰写甘肃通史的指导性意见：1.正确处理好中国历史与甘肃历史的关系，应把甘肃历史放在全国乃至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撰写，不能脱离华夏文明形成、发展的主流，甘肃历史是中华民族历史血肉相连的组成部分。2.展示甘肃历史的亮点，书写甘肃各族人民为维护祖国统一、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充分体现甘肃人民的勤劳与智慧。3.材料力求丰富，内容必须充实，论述应有深度，吸收史学新成果，突破传统史学的束缚。4.遵循通史体例，避免因分卷断代撰写而割裂历史，文风朴实，读者喜欢。

《甘肃通史》内容的时间跨度，从远古到现今，全书按时间顺序和发展阶段分为八卷，即先秦卷、秦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宋夏金元卷、明清卷、中华民国卷、当代卷。其中先秦卷阐述了甘肃地区的建制由来、自然环境和生态变迁。作为通史研究的一项尝试，每一章章首作者撰写了该章历史概述，以期做到前后呼应，并做到阐述历史与分析综合的有机结合。经过历史学家历时5年的潜心努力，肩负“彰显盛世、传承文明”这一历史使命的八卷本皇皇巨著《甘肃通史》最终付梓。这是甘肃几代人的期盼与等待，我们怀着严肃、负责的态度将它呈现给社会各界。当然其中也存在不少疏漏和遗憾，望社会各界谅解、理解并给予批评，不足之处留待后世修史者校正、补充。

二

编写《甘肃通史》既是继承历史，也是现实社会的需要。

修史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从最早“左史记言，右史记事”^①开始，到历代史学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我国一直有着非

① 《汉书·艺文志》。

常完善的史官制度、优良的修史传统与丰富的史学理论。中华民族非常重视历史经验的总结及其对现实社会的借鉴和个人修养的激励。特别是那些埋头苦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中国脊梁，更是从丰富浩瀚的历史当中汲取人生的价值取向，关注民族的前途、国家的未来。“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新世纪、新阶段组织编写《甘肃通史》，正是继承优秀文化、总结历史、推陈出新的重要文化事业，是当代甘肃人民承担这个时代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的重大文化建设举措之一。它的出版，必将丰富中国历史，必将促进当前甘肃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

“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离不开精神力量的支持。同样，一个地区的生存发展也离不开其优秀的人文历史传统，以及在这种传统文化中所形成的地域精神。

历史是现实的基础，现实是历史的延续。人类文明无一不是在已有的自然条件和人文环境中传承发展起来的。学习研究历史，就是要了解昨天，服务今天，面向明天。这就是昨天的历史为今天的发展服务。古人云：“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③

悠久的历史传统，深厚的文化底蕴，多样的民族融合与伟大的社会实践，孕育了甘肃所特有的精神气质与民族性格，形成了艰苦奋斗、锲而不舍、包容创新、团结奋进的精神品格，不但为中华文明增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振兴中华民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8页。

^③ 《新唐书·魏征传》。

添了丰富的内容，而且推动了甘肃历史的前进，是甘肃各民族人民的巨大精神财富。书写甘肃历史，就是展示甘肃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独特魅力；阐述甘肃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改造自然、艰苦创业、求真务实、包容创新的辉煌历程；彰显贯穿于兴起、衰败、曲折、崛起等各个时代一脉相承的甘肃各族人民共同铸就的陇人之魂——甘肃精神。

三

甘肃历史内容丰富，特征鲜明。《甘肃通史》充分体现了甘肃历史的发展规律与阶段性特征。

甘肃曾有过领先国内其他地区乃至世界的光辉历史，创造了辉煌而发达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为缔造中华民族做出了贡献。七八千年前的大地湾文化，其文明成就在当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是以传说中的人文始祖伏羲为首领的甘肃先民所创造的。周王朝的先祖从陇东黄土高原崛起，天人合一，以农为本，以德治国，奠定了中华民族的礼仪与道德传统。横扫六合、一统天下的秦王朝，也是从黄土高原走向中原，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铸造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政治、经济、文化格局。自西汉张骞凿通西域之后，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由东向西横贯甘肃全境，甘肃成为中西陆路交通的孔道和门户，彻底融入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布局当中，承担着各个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两汉魏晋时期，人才辈出，文化兴盛，西域文明与中华文明在纵横千余里的甘肃大地交切碰撞，促进了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融合，为中国文化的创新与转型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和广阔的空间。隋唐时期，民族和睦，社会繁荣，经济鼎盛，“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胡商外客，往返如织，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空前兴盛。包容、创新、开放、进取的甘肃各族人民创造了灿烂的文明，沿丝路主干道遗留下了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化遗产，这就是以敦煌莫高窟与天水麦积山石窟为代表的众多佛教石窟。璀璨夺目的文化艺术仍然

启迪着今天的文化繁荣。飞天梦变为现实，奔马精神鼓舞我们前进。

当然，社会历史的前进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呈螺旋式上升的。甘肃历史的发展也不例外。自宋而降，由于生产力的落后和社会动荡不安，甘肃进入了一个比较长的徘徊不前、缓慢发展的时期。事实上，从唐中叶起，甘肃发展起来的社会生产力由于统治阶级的昏庸、各民族贵族之间掠夺战争的巨大破坏，已经停滞不前。少数民族贵族与中原统治阶级之间的战争使得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陇原大地，烽火连天，生灵涂炭。同时，落后的生产方式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曾一度繁荣的畜牧业，都没有解决民生，反而使得生态恶化，灾害频仍。封建帝制决定了封建社会走向没落与衰退。另一方面，随着海上丝路的开通，中国政治经济中心的东移与南迁，“国家根本，仰给东南”^①。甘肃成为偏僻之地，社会经济总体发展远远落后于全国水平。“陇中瘠苦甲天下”是封建社会后期以至近代甘肃的社会现状。尽管如此，甘肃各族人民在长期同严酷的自然环境的不屈抗争中，在广泛的民族交往与融合中，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在艰难困苦的逆境中造就了陇原儿女独特的精神品格：坚忍不拔，顽强拼搏，锲而不舍，奋发有为，为甘肃的复兴与崛起积聚了精神力量。

从近代开始，甘肃走向崛起与复兴的时代。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欺凌的加深，更是加剧了甘肃经济的落后与社会政治的衰败。“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穷则思变。不甘落后、顽强拼搏的甘肃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通过革命从根本上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开辟道路。于是就有了90年前响应辛亥革命的甘肃秦州起义；就有了80年前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革命斗争和陇东革命根据地，以及随后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近百年的艰苦抗争，终于迎来了新世纪的曙

① 《宋史·范祖禹传》。

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甘肃历史的新纪元。

新中国成立后，甘肃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了大规模的开发与建设。依托资源优势，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甘肃建成了一批现代化的、全国性的石油、化工、电力、机械、有色等基础工业基地，为国家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为甘肃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新时代陇原儿女艰苦创业的历史，丰富、发展了甘肃人民在长期严酷的自然条件与恶劣的政治环境下磨炼出来的、最能体现特质和灵魂的甘肃精神。陇原儿女无愧于时代的骄子，在以“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为核心的甘肃精神支撑下，创造了一系列的辉煌业绩：金川公司、白银公司、酒钢、兰炼、兰化、玉门油田、兰铝、机械电器、电力等甘肃现代新兴工业，构筑了甘肃的新型工业格局和国民经济体系。核工业的发展，东风基地的建设，“两弹一星”、“神州七号”发射成功都给甘肃人民以鼓舞。在改革开放的时代，甘肃人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科学发展观，使甘肃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不断健康发展。尤其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任务的实施，给甘肃的全面繁荣带来了宝贵的机遇，综合实力跃上了一个新台阶，社会和谐，人民安居乐业，教育、文化、科技等各项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彻底结束了“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历史。春风已度玉门关，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的鼓舞下，2600万陇原儿女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正在创造新的辉煌，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工业强省战略，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努力实现甘肃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宏伟目标迈进。

四

《甘肃通史》在立项与撰写过程中，得到甘肃省委领导的具体指导，省委领导多次召集会议，听取写作进度，并尽可能地提供工作条

件，为保证质量、时间创造了非常有利的环境条件。

《甘肃通史》的主编刘光华先生，以耄耋之年，不惮其劳，总纂大纲，审读稿件，其认真负责、敬业的精神，令人感佩至深。各卷撰写者数易其稿，耐心细致地听取各方改进意见，撰稿过程中字斟句酌，呕心沥血，其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令人铭念至深。

承担出版任务的甘肃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一丝不苟，认真把关，与作者深入交流，研习问题，其对出版事业负责、追求精品的工作作风，令人敬佩。

最后，我谨代表《甘肃通史》编委会对在立项、撰写、出版过程中付出辛勤劳动的领导、专家、档案管理者、出版工作人员表示最诚挚的敬意！对省财政部门给予资金的支持表示感谢。

周德祥
2008年1月

总 序

《甘肃通史》的出版发行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这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对繁荣发展民族文化的强烈历史责任感。

历史记载着文化信息，文化引领着历史前进。我们要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就必须在历史长河中去寻找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记忆，传承中华文明特有的文化基因，并站在历史提供的新起点上创造出符合当代精神和时代潮流的新文化，使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得以延续，始终保持中华文化的独立品格和独特魅力。

甘肃作为中华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众多的民族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密切交往，休戚与共，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历史文明，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回眸昨天，甘肃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已成为这片热土的根脉；放眼今天，甘肃人民奋发图强的火热生活，传承着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展望明天，伴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甘肃人民将谱写出更加辉煌的历史篇章。

一部《甘肃通史》，浸润着这块土地上特有的人文精神。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这是我们走向美好明天的精神动力。

是为序。

陆 浩
2007年11月

前　言

一

甘肃位于中国的西北部，黄河依势从境内穿越而过，北依沙漠，南临雪山草地，多样的地貌造就了甘肃独特的人文环境。甘肃在古代文献中通常被称作河陇，即河西陇右的简称，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勤劳、勇敢的甘肃各族人民在这块土地上创造了灿烂的文化。

甘肃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打制石器的第一块标本就是在陇东发现的。秦安大地湾文化不间断地延续了3000年之久，与大地湾文化存在源流关系的中原仰韶文化，在黄河中游广大地区充分发育，成为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主体性文化之一。继大地湾文化之后的金石并用时代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分布范围更加广阔、稠密，著名的甘肃彩陶就是以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最为精美。

秦国的崛起，是春秋、战国时期甘肃历史上意义最深远的大事。早在西周孝王时，秦国的先祖就在今张家川、清水一带生活。秦襄公平定犬戎，拥戴周平王东迁，被封为诸侯，这就是秦国之始。秦武公创设了我国历史上年代最早的县——邽县和冀县。秦孝公实行变法，普遍推行郡县制，设置北地、陇西郡，甘肃东部被纳入封建管理体制之中；修筑了秦长城，为秦国西部和北部的疆域划出了界线。一部东周史，由秦襄公被封为诸侯揭开了扉页，又以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而掩卷。

秦汉时的甘肃地区，处于全国社会发展的主流。汉武帝指挥反击匈奴的战争，统一了河西广大地区；派张骞联络西域诸国归附汉朝，开辟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汉朝在新拓地区修筑了东连秦长城、西

至盐泽的汉塞，派大批戍卒防守、屯垦；设置河西四郡，募民边塞，发展农业与畜牧业，赢得了“凉州之畜为天下饶”的美誉。

秦汉时期，甘肃尊老、尚武的民风冠于全国。以王符《潜夫论》为代表的思想文化，在全国独树一帜。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铜奔马等，反映了当地青铜铸造和造型艺术的极高水平。多种汉纸的发现，证明了甘肃人民对发明造纸术的贡献。

魏晋南北朝上承秦汉、下启隋唐，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分裂割据时期。三国时，诸葛亮曾“六出祁山”。十六国时期，仅河西地区就建立了五个凉国。至于北朝，北魏统一北方一百多年后，又分裂为东魏、西魏和北齐、北周等，并与南方的宋、齐、梁、陈对抗。它们或在甘肃境内争夺政权，或对甘肃进行统治。直至581年，隋取代北周，灭齐亡陈，结束了长达四百余年的分裂局面。

汉晋之际，周边民族的内迁，既给中原地区带来了战乱，也给中华民族注入了新鲜血液。甘肃既有迁出的民族，也有迁入的民族。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使氐、羌、鲜卑、匈奴、羯、敕勒、柔然、杂胡等族称逐渐消失。这是我国民族融合的第二个高潮。战乱中大批中原土人西逃河西，河西成为当时社会相对稳定、存续中原文化的中心。

由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佛教从西域传入甘肃，在甘肃生根发芽，开始了它的中国化过程。著名的敦煌莫高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凿的。

隋、唐前期的大统一，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昌盛，甘肃的社会经济得以长足发展，达到了鼎盛。609年，隋炀帝西巡，并在张掖举办了以“互市”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性贸易会，炀帝还亲自接见了西域二十七国使节，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资治通鉴》记载了唐朝开元、天宝年间甘肃经济的发展情况：是时“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

755年，“安史之乱”爆发，由于驻防河陇的边兵东调平叛，已

控制青海大部的吐蕃乘机进占河陇地区，以其原有的部落制取代唐朝的郡县制，并设青海、鄯州、河州、凉州、瓜州五节度使统治；在五节度使之上，另设东境节度大使。848年，张议潮领导沙州人民起义，驱逐吐蕃守将，收复了河湟11州之地，并献图籍于唐。但在藩镇割据大形势下，唐末五代时期中央政权也只能控制甘肃东部一小块地区。

隋唐五代甘肃的文化，呈现出历史上最繁荣的景象。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祆教，以及吐蕃尊奉的本教，都在这里传播弘扬；佛教石窟艺术发展至极盛，敦煌莫高窟、瓜州榆林窟、炳灵寺石窟中涌现出了大量的艺术杰作。西域的音乐、舞蹈通过凉州传入内地，大大丰富了中华文化。

10—14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宋、夏、辽、金、蒙古诸政权分立共存，走向元朝统一的重要时期。甘肃历史发展既受全国局势的影响，又因地处西北一隅，因而呈现出自己的风貌与特色。

宋朝建立，甘肃境内的政权有甘州回鹘政权、曹氏归义军政权、沙州回鹘政权、西凉府吐蕃政权和陇右吐蕃诸部等，宋朝仅控制着环庆、泾原、秦凤诸路。各个政权因地制宜，发展经济，回鹘的畜牧业、西夏的农牧业、宋代的屯田等各具特色。在各个政权此消彼长中，党项夏州政权进入甘肃，消灭了西凉府吐蕃、回鹘、曹氏归义军政权，统一了河西地区，并于1038年建国，史称西夏。1127年，金军南下灭亡了北宋，金朝控制陇右，南宋偏守陇南一隅。宋夏、宋金斗争，是甘肃历史的重要内容。13世纪蒙古兴起，统一了中国。1247年，蒙古贵族阔端与西藏地方宗教领袖萨班举行凉州会谈，标志着西藏正式纳入中央政权的管辖。

元朝在地方实行行省制，首设甘肃行省。河西属甘肃行省，陇右属陕西行省，河州路和脱思麻路属宣政院辖地。元朝虽然实行重农政策，并迁徙中亚人在甘肃屯田，但统治集团的保守、嗜利和苛征重敛，严重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宋元时期，儒学在甘肃地区没有中断。北宋重视兴办学校，对蕃

部子弟进行教育；西夏在河西地区设州县学，行庙学制，推广使用蕃书；金朝崇儒重学；元朝兴学重文，推崇藏传佛教。生活在这里的众多民族，文化上相互影响，使甘肃文化具有鲜明的多元化、地域性特点。

1368年，明朝建立，甘肃地区实行府州县制与军事卫所制并行，府州县属陕西布政使司，卫所属陕西行都指挥使司。这里驻有大量的军队，戍守着边塞长城；为保障供应，甘肃的卫所屯田最具特色，屯田管理体制臻于完善。这一时期，甘肃出现了回、东乡、保安、裕固等新的民族共同体，甘肃也是全国重要的回族聚居区之一。这些新的民族共同体与汉、藏、蒙古族一起，共同创造了甘肃历史。

清朝初年，甘肃的行政建制仿行明制。康熙三年，陕甘分治，甘肃属陕西右布政使司（后改巩昌布政使司、甘肃布政使司），先驻巩昌，后移驻兰州；雍正三年，省陕西行都指挥使司及卫所，设置府县。甘肃行省管辖着九府、六直隶州，陕甘总督驻节兰州，兰州成为西北地区的军政重镇。甘肃既是清前期镇压西北民族叛乱的大后方，又是镇压同治回民起事的中心地区，百姓深受繁重的徭役和战乱之苦。晚清在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下，割地赔款，民不聊生。清末的新政没有挽救腐败的清王朝的命运，而一场推翻封建制度的大变革已然来临。

明清时期，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是甘肃的主要宗教。清代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中心转向甘肃，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影响着西北穆斯林信众。随着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兴起，众多黄教寺院陆续建成，其中最具影响的当属康熙年间兴建的拉卜楞寺。在学术方面，甘肃学者张澍、邢澍、李铭汉推动了晚清兴起的经史之学。

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朝统治土崩瓦解。甘肃革命者举行了秦州起义，响应共和。而以赵维熙为代表的封建官僚亦宣布共和，成立了甘肃军政府及临时议会。1925年，冯玉祥入甘，改所部为国民军，并与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国共两党选派党员到国民军中宣传

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党员随国民军进入甘肃，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甘肃特别支部，并帮助国民党建立省、市、县各级党部，坚持统一战线政策，扩大了影响。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国共合作破裂，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转入地下，国民党反动势力控制了甘肃。与此同时，中共领导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和武装斗争得到了发展，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并粉碎了国民党的两次“围剿”。1935年9月，红一方面军进入甘肃；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与前来迎接的红一方面军在会宁会师，长征胜利结束。

抗战初期，中国工农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在兰州成立了办事处。1937年10月，中共甘肃工委在兰州成立，全省抗日救亡活动蓬勃展开。陕甘根据地建立起了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实行减租减息，开展大生产运动，成为全国人民抗日的大本营。

抗战期间，由于战争的需要，甘肃兴建了石油、煤炭、机械、发电、化工、水泥等近代工业；西兰公路通车后，又新修了西兰、甘新、甘青、甘川、华双、平宁六大干线公路；1945年宝天铁路铺轨完成。甘肃还修建了一些大型的水利工程。文化教育方面，成立了甘肃科学教育馆、兰州图书馆、敦煌艺术研究所；宣传抗日的进步报刊雨后春笋般出现。全省有中学108所，小学7553所；高等学校有西北农业专科学校、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医学院兰州分院、甘肃学院等。甘肃近代化建设大发展，而文化教育尤为显著。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推行反革命内战政策。1947年又颁布了“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将中国转向了战争体制。中共西北局决定恢复中共甘肃工委，在甘肃大力发展革命力量。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党政权覆亡。同年7月，第一野战军向甘肃进军，先后解放平凉、天水，8月26日，兰州解放，结束了国民党在甘肃的统治。